

早期中国

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
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第1辑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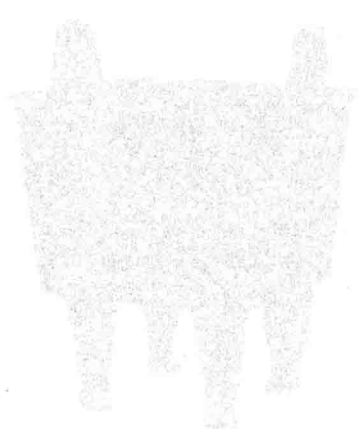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IDHT20140507)

早期中国研究

STUDIES IN THE EARLY CHINA

第1辑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 丽

责任编辑 杨新改

英文翻译 张良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中国研究. 第1辑 /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010 - 3898 - 5

I. ①早… II. ①北… III. ①考古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K87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065 号

早期中国研究 (第1辑)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

文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16.5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898 - 5 定价: 98.00 元

《早期中国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严文明

主 任：韩建业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小波 陈悦新 张 经 张宝秀

顾 军 韩建业 熊黑钢

本辑主编：韩建业

编者语

我们这里所谓“早期中国”，实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

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顾颉刚等主编的《古史辨》中有集中体现。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定论或者不很清楚。即便是商代晚期和周代，其作为“早期中国”的范围和格局也都还歧义纷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来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

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没有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地广泛地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集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代序)

严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这次“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就要结束了，大家从各个不同方面谈到有关早期中国的一些问题。

最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学院的张维为教授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震撼》，影响甚大，他提出中国具有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是又绝不放弃自己。这种论调是现在大家所喜欢听到的，但是否完全是这样的呢？我们中国是怎么走来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正如此次会议提到的那样，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不是多个民族国家？

我也长期琢磨这个问题。我不说这一定是一个优点，但这是一个事实，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中国改朝换代多次，但是文化没有中断，我们讲早期中国一直可以追溯到史前。这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是如何产生的呢？我长期以来一直寻找它的客观基础，在最初写《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时就琢磨这个问题。过去一些中国的学者总讲中原中心论，什么都是中原对周边文化产生影响，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疆域这么大，其文化一开始不可能那么统一，但是以后却朝着统一的

方向走，逐渐形成我过去提出的有中心、有主体、有外围的中国文化发展结构，这首先要归因于地理环境这个基础。

中国这么大的地理单元存在两个对以后文明发展有极大影响的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旱地农业，一个是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产量到现在都是世界第一），形成两个农业体系。这两个地方毗邻，范围又很大。大家考虑一下世界上其他最早的文明中心，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与中国相比都显得很小时，尼罗河流域每年定期涨水灌溉，相对最稳定，但因为范围小，农业又单一（小麦、大麦），一旦收成有问题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样因为范围太小，也受不了外界大的冲击，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是外力将其消灭，现代人和古代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中国文化是完整延续下来的，这说明农业基础非常重要，农业（主要是谷物农业）是产生文明的基础。中国的两大农业体系可以互补，一方歉收另一方可以弥补；地盘很大可以有回旋的余地。而两大农业体系又处于中国的大致中心的位置，容易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中国能够比较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再加上中国周边有高山、沙漠、大海，几个最强势的古代文明距离中国核心地域也都比较远，无法高强度地影响中国，所以中国就可以独自发展。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外来文明的因素，只是说它们不会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分裂，存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这是因为各个地方的文化、民族不一，内部还是多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就会削藩平乱，平定不了就会暂时独立。但分了之后为什么还会再合起来？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想逐鹿中原、统一中国，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想统一中国；最典型的是清代的努尔哈赤，虽偏安于一隅，力量壮大后还是想统一中国，不甘愿长期独立、分裂。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第二个基础就是人。中国人基本属于蒙古人种，绝大部分是东亚蒙古人种，少量北亚蒙古人种及南亚蒙古人种。同样一个人种，血缘相近，语言自然也会相近。中国的语言绝大部分属于汉藏语系，据统计98%的中国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而在汉藏语系中使用汉语的中国

人占94%~95%，所以基本上是同一个语言。但是这个语言又有很多方言，现代中国有七大方言。过去总有人讲寻找中国失落的文明，我认为中国的文明没有失落，比如给一个完全不懂甲骨文的现代人稍微讲一讲，他很快就可以读出几句。这说明中国的语言有很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跟人种的一致性有关系。中国语言的特点是什么？在语言分类中叫词根语，又叫孤立语，跟黏着语、屈折语大不一样。汉语是一词一字一音，这个特点决定了我们不会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汉字任何人都可以读，可以用普通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广州话，不必统一语音，因为大家的语法基本上是一样的。统一的语言文字，在统一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别的文化所没有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政治上的行为也很有成效。中国西周的时候实行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唐兰先生在讲古文字学的时候提到，不要以为分封就是周人创立的，殷人、夏人也有可能实行分封。比如“惟殷边侯田”，有侯有田，这说明商代也是分封的，周代不过是更加系统化。周朝推行“王化”，无非也就是华夏化。由于是一种文字，各种制度、文化就容易得到统一。在中国的统一性上，夏商周就是统一的，无非是版图小一点；夏商周的统一方式与秦始皇不一样，他们更尊重地方，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给各个大夫，层层承包。这种制度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充分发挥各地自主权和优势，二是有一个中央统一管辖。实际上也是不断地统一、王化的过程，既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地方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称霸争雄，但是不管怎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总是需要“天子”这样一个旗号的。有的人认为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我认为秦始皇没有统一文字，我们本来就没有几种文字，六国的文字就是一种文字，秦始皇只是统一了文字的写法。有人说他第一个统一了中国，我也不赞成，秦始皇只是建立了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郡县制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一些国家在实行了，秦无非是把这种制度推行到全国。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统一过程就已经在进行，比如楚国就灭掉了40多个国家，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灭小国统一成大国。秦始皇不过是把几个大国再统一成一个更大的秦王朝。这个更大的王朝的基础还是周天子的天下，只是改变了统治方式。只是过分强调统一，

过分强调集权并不是好事，中国的特点就应该是既统一又多元，尊重各个地方、民族的特点，当然还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你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中国有什么样的人，这样才会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治理这个国家。而治理这个国家，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只应该管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应该给各地方、各个民族一定的自由，这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我们应该考虑对早期中国的研究能给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启发。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2012年在《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发表，大家可以参考，不对之处请大家多提意见。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赵 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当前学界有个共识：如果说夏是王朝时代的开始，那么夏以前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一定有一个基础。我们不妨把这个基础比喻为“荷叶”（段宏振语）。单就地理空间而言，“荷叶”早已存在，但问题是文化交流的网络机制从何时开始？荷叶上不同位置水珠如何运动融合？有一个共识是，在“荷叶”上各区域文化的运动过程中，中原地区，也就是所谓华夏及最初中国出现的地方，在以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也就是笔者称之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渐渐浮出水面。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原地区重要历史作用的内容是什么，作用方式又是什么，其对中国以后的发展究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以后的文化、历史赋予什么样的性格及特点？我们迟早要回答这些问题，希望集学界力量能够得以解决。这里想借用韩建业在研究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社会发展时提出的“北方模式”，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虽然不像北方长城地带表现得那么极端，但也具有相似性。基于这种“北方模式”，我认为中原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与江南地区或者黄河下游相比，并不丰饶，这决定了该地区以较粗放的粟作农业为主。虽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期的时候，有些学者发现仰韶晚期后中原也有水稻，中原地区从

粟作农业单一发展到多种经营，这种多种经营促进了中原社会可持续发展。但对这种认识笔者存疑，稻作在中原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这还有待研究。中原的生产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而非大农业。由于彼此地域相连，环境相似，因而没有产生大规模贸易，其社会的分化程度也不高。而江浙、山东文化的墓葬可以清楚地划分出不同的等级，社会分层化显著，并且其社会分层化的表现特点是金字塔形。韩建业在论及这一时期北方社会分层情况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一点，即社会分层化不太明显。

第二，由于中原地区史前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其难以独立存在，甚至难以以比较小的生产单位的方式存在，必定要依托一个比较大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这种集体也是现成的，就是氏族组织。这种氏族组织一直保持下来，成为该地区社会最基本的基层单位，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由于社会分层化程度不高，我认为中原地区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集体与集体之间，而非集体内部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

我们知道从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文化格局非常混乱，北方文化大规模南下，南方文化北上，并且东方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也有大规模西进的过程，这导致中原地区文化的不同集团拥有不同的背景。混乱情况还包括这一时期的杀殉、暴力以及武器集中出现等现象，这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尤为惨烈。比如王城岗遗址一个灰坑就发现大约 10 人的遗骸，在陶寺遗址发现用人的头骨进行奠基仪式，另外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邯郸涧沟遗址还发现人头盖杯，说明当时社会处在非常动荡的环境。我认为很难说这些人就是奴隶，外族俘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小农业生产很难存在这么多生产性奴隶。换句话说，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集体之间而非集体内部，这样就要求每个集团要有强有力的首领，同时决定了他们的权利是军事性和世俗性的。另外，这一时期周边地区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中原地区对这些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技术层面吸收较多，宗教方面却不是这样。比如良渚文化盛行的玉琮到中原以后只保留了它的形态，而没有接受它的纹饰。而玉琮的神人兽面纹等纹饰对良渚人意义重大，全良渚人都信仰。从张陵山出土的几件玉器来看，早期是具象、写实的，以后越来越抽象、神化，我认为这是一种祖先神的崇拜。中原人并不

接受良渚人的祖先神，但是可能会接受“黄琮礼地，苍璧礼天”的观念来加强统治，这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接受周围文化的先进成果。这样就造成中原地区的宗教色彩不及周围地区浓重，换句话说，宗教在社会运作中发挥的作用不及周围地区大，主要是世俗政权。

这些特点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哪些作用？我总结认为这种小农业生产经济决定了血缘的基层组织结构长期保留下来，以后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复杂化等原因，这种基层组织也发生变化，到西周就发展为范围很大的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是权力、财富的分配；扩大到国家层面就是分封制。为了维持这种秩序，就发明了一套礼制。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分明的社会中除了最高统治者具有最大的权力、自由外，其他的社会成员基本处于固定的位置，没有多大的表达个人意志的自由。这大概是东方社会很大的特点。另外，社会上层权利高度集中还反映在神权地位有限，导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王权并重的神权体系，不存在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宗教权。中原正好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那么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除了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以外，这里的人是如何看世界的，也就是“天下观”也是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治水以及划分天下为九州的记载，虽然是传说，但是暗示这一时期中国人已经有了天下观，商周继续发展。这种天下观导致其对外关系是涵化、容纳和吸收，大别于西方社会。这些情况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个基础。这样一个“北方模式”的形成可能是我们探索早期中国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或者标准。

目 录

编者语	(i)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	
闭幕词（代序）	严文明 (iii)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	
总结发言	赵 辉 (vii)
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	李新伟 (1)
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	韩建业 (19)
最初“中国”的考古探索简析	何 驷 (36)
略论中国上古的疆域“四海”	武家璧 (44)
《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赵春青 (58)
先秦时期尧舜禅让观述论	钱耀鹏 (85)
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与早期中国	段宏振 (97)
城市视角下的中原早期文明	许 宏 (107)

中国化进程的一个区域视角

——舜葬九嶷与湖南华夏化的历史过程 郭伟民 (115)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文化整合运动 刘 辉 (128)

再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续

——也谈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的转折 孙 波 (146)

关东地区地域文化的整合与汉文化的形成 宋 蓉 (166)

西拉木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 索秀芬 李少兵 (179)

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五段一组地层单位文化

性质分检 李维明 (193)

贡纳与贸易

——早期国家的玉石器生产和流通问题初探 黄可佳 (198)

早期冶金与中华文明探源 胡可佳 凌 勇 (212)

环境考古的实践与理论 周昆叔 (221)

粟作农业在华夏文明形成中的意义 张俊娜 夏正楷 (228)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

纪要 张致政 程鹏飞 褚 旭 韩建业 (241)

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与生俱来的使命

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来的使命，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轰然崩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1]。以“真命天子”自居的帝王们可以简单地用“天命”来维护自己君临天下、协和万邦的合理性。新生的民国不可能把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维系在天命上。新生民国的领导者和知识精英本拟继承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发扬中国古史系统，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被大力宣扬^[2]。但正当此时，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3]，传统古史系统崩溃，大一统观念失去了强大的依托。

与此同时，自17、18世纪即初露端倪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渐有兴旺之势，“文化西来说种种，在二十世纪初年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支配着大多数知识分子。”^[4]

* 本论文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化保护技术研究”的资助（课题编号2010BAK67B11）。

在此情况下，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新生的现代考古学。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5]

众望所归，中国考古学自此便承担起了“科学地”重建古史的重任，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深知，重建古史实际上是为新生的民国建立史前的基础，使其至少在文化上更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学术界一般以瑞典学者安特生 1921 年在仰韶村等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诞生的标志^[6]。但安特生更依据仰韶村获得的资料提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7]反以众所期待的考古学加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于迷茫中的中国古史重建者们来说，正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自然认为重建中国史前基础的第一步是确认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正如李济在 1931 年谈及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所言：“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8]

二 “夷夏东西”

安特生的考古工作主要源自他的个人兴趣和偶然发现。真正目标明确的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以 1926 年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对西阴村的发掘为肇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重建者心中，这一“中国文化的原始”最好可以与古史记载相印证。李济曾明确指出：“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李济在选择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时，依循文献的思路非常明确。他选择晋南地区进行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记载